圆桌讨论:为什么西方政治体制难以走向成熟？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1-12-30[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75346&idx=1&sn=2c7b8c40a70f1d2146a01f7c2bed6b6d&chksm=8bb06d43bcc7e45502c0bc646f9ba2b42cee4e39e7703e30f6daaf7b7a6f4c3a4d001845645a&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3)

收录于话题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主持人  |  何婕

嘉宾

张维为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院长

郑若麟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研究员

主持人何婕：张老师给我们综述了从国际社会方方面面来看十九届六中全会，包括《决议》，他们的一些观点，那我们还是来分析一下，来自于国际社会的这些观点。你比如说像CNN，它有一个说法，它说中国历来注重总结历史，总结过去，说明它也看到了咱们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总书记一直说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过去能找到未来的答案。

张维为：实际上中国人关注历史，很多外国人都注意到了，他只要稍微是关注一下中国，读一点关于中国的经典的著作，他就会了解这一点。你比方基辛格的这本影响比较大的《论中国》。他开始就说了，说毛泽东决定要向印度开战，打自卫反击战，招来些老将，然后就讨论，从唐朝开始，唐朝时候跟印度打了一仗，结果打了以后，反而中印关系好了几百年，然后元朝又打了一仗。中国会把一千多年前的事情提起来，好像就昨天发生的一样。

主持人何婕：对。

张维为：其它国家没有这个的。实际上这确实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另外就是你提到CNN，你发觉没有，很多美国的学者或者是政治人物，往往是有欧洲背景的，最容易注意到中国的历史观，因为欧洲相对而言比美国更有历史。你看有点历史观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保罗·肯尼迪，基辛格是犹太人，布热津斯基是波兰人，保罗·肯尼迪是英国人，就跟这个有关系。所以我记得当时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就说，在美国的学者中间讲英语带点德语口音的往往是学问比较深的，美国自己学政治学出来的一套，很不靠谱的。它背后确实是有没有历史感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是好的。

主持人何婕：您刚说这个历史感的重要性，有悠久历史的人能够读懂悠久历史。确实，我们还是要看到国际媒体它有一些些的客观的观点，但就像郑老师说的，你也要注意到，在它们的客观观点背后经常也会拖很多酸溜溜的东西，或者就是对中国产生极严重误解的部分。

郑若麟：它的总体上应该说越来越负面。

主持人何婕：您觉得趋势是越来越负面？

郑若麟：它的主流媒体。

张维为：对。

郑若麟：但是它的自媒体，它的舆论场在变，为什么我这么说？比方说这本书，这本书就是法国的一个总工会的前负责人和维瓦斯，联合了17个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一起写。为什么？他就说拿去“眼罩”来看中国，为什么？他们就意识到西方主流媒体看中国一直有偏见。很多中国发生的东西，他们就是看不见。他们看见的往往是中国没有发生的事，比如说什么新疆“种族灭绝”，这个明摆着是没有发生的事，他们会看见。

主持人何婕：把想象当真实。

郑若麟：对。这个世界应该说我们从西方文艺复兴开始，对中国的观点是发生了多次变化，开始曾经把中国想象得非常美好，像伏尔泰把中国想象成天堂一般，然后到了后来19世纪，到了孟德斯鸠开始，把中国想象成最专制、最独裁、最封建的国度，后来又变了，二战以后曾经一度在戴高乐的领导下，他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到了最近这一、二十年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欧洲、法国对中国的观点，尤其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对中国的负面的看法又在增多，这次对六中全会的报道基本上还是沿着这条路线在走，但是就像我在刚才的演讲里说的，有些正面的东西他们不得不说了，因为老百姓自己都看到了。

张维为：就是我讲的，你要说中国做得好，中国非常成功，我们有大量的数据，而且是西方的学者做的，大量的民调，西方的民调机构做的，我可以列出PEW（皮尤研究中心）、Ipsos(民调机构益普索)的，Asian Barometer（亚洲民主动态调查），都是说明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远远高于他们。以法国为例，2019年Ipsos(民调机构益普索)的民调，91%的中国人，91%认为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英国21%，法国20%，所以我那次就是12月2日在“中外学者谈民主”高端对话会中，我就问英国和法国记者，都在场。

主持人何婕：对，你问了现场的国际记者。

张维为：我说你们国家这么差的（数据）记录，一定有很多人权问题，肯定是，80%的人认为国家在错误道路上，但是这些东西它主流媒体不报道，就是个机构的民调而已。

主持人何婕：对，但是我们在分析比如说一些国际学者，思路比较清醒的媒体，他们在看咱们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在这种解读当中，读出非常多丰富的内容。你比如说著名学者马丁·雅克先生，他就说“中国的治理进入了成熟期”。张老师您对这句话的理解是？

张维为：马丁·雅克因为我非常熟悉，我们经常通电话，总体上我觉得他是对中国真的比较了解的一个外国学者。那么他说中国的治理模式已经相当之成熟，他是非常周密的考虑，这次疫情防控你看得出来的，过去西方他说我们经过启蒙运动，你们中国没有启蒙运动，对不对？启蒙运动什么？科学、理性，再上升到叫现代性。而这次疫情防控看得出来，谁更讲科学，谁更有理性，谁更具有现代性。不光是在领导人决策的水平，乃至民间老百姓的水平，谁更理性、谁更科学，谁更具有现代性。我把这个问题上次也问了记者，他们没回答我的问题。

主持人何婕：回答不了。

**为什么西方政治体制**

**难以走向成熟？**

郑若麟：西方这个体制，我认为永远不会像中国这样走向一个成熟期。

主持人何婕：您觉得它永远不会吗？

郑若麟：为什么？非常简单，就是它的选举体制所决定的。它的选举体制，第一，它的一切就为了选举，选上了我就执政，选不上怎么办？解散，我这政党解散，因为什么？选民不喜欢，我要重新拿出一套能够让选民喜欢的东西，而选民喜欢什么东西，各个阶层有各个阶层的不同的喜欢的东西，他们不能代表大多数选民的利益，所以他们不理解中国共产党是代表着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而他们的各个党都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你说它怎么能够达到一个成熟的治理经验，不可能的。

主持人何婕：就好像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我们经常用的词，比如说发展、长期、规划、目标，这个对我们来说，可能每个人个人生活当中都用，更不要说一个国家。但是您刚刚解释了，在西方可能这些全都是短期的，那没有长期的大量的奋斗目标的指引，谈不上成熟。

郑若麟：对。

    张维为：再看看整个西方世界的领导人几乎都是政客，就是为了选举而选举的，很少是能有长期计划做事情的。某种意义上是它这个选举制度使然，因为它选举的假设人是理性的，你可以投出理性的一票。但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金钱的卷入，上次我们讨论到，就一家公司，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它就可以决定英国脱欧了。

主持人何婕：对，可以左右一场选举。

郑若麟：对，选举的可控制性，使得西方目前说它是民主国家，我认为这个不是民主国家，是民选体制，而不是民主体制。什么叫民选体制？民主应该是……

张维为：人民是主人。

郑若麟：对，而他们把它简化成选举。

主持人何婕：对，所以一个围绕着选举的短期的政党也好，或者政治界也好，它就很难真正地理解长期的，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党的奋斗，包括国家的奋斗。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国际社会对十九届六中全会的观察，其实各种各样的声音里面，西方的只是一部分。

张维为：对。

主持人何婕：我们还要看到大量的声音，它在认真地学习，在认真地观察，包括有国际政界的，来自于非洲的、东南亚很多国家的领导，他们也都在说要借鉴中国的整个的发展经验。所以我们在看国际社会的解读的时候，要注意到这种全面性和丰富性。

张维为：实际上现在非西方世界十分关注中国，我就在这11月这段时间里边，我参加好几个活动，一个是跟着南非最高行政学院，我给他们做了一个讲座，视频的。他问题问得很具体的，就是你们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怎么做的，我们很困扰。

主持人何婕：其实是非常具体的问题。

张维为：非常具体的问题，他们希望能借鉴这方面的经验，但是确实很难。我还参加一个“南南人权论坛”，也是通过视频参加的，就是讲人权，我就说人权一定要是每个国家有权利确定自己的优先顺序，这个顺序不能够让其它国家、西方国家主导的，因为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比方说你有一亿美元，一亿美元是用在改善学校的宿舍，还是修一条公路，还是给儿童发食物补贴，这个你每个国家根据自己情况来决定，不是西方说，西方强调政治公民权利放在优先地位，选举什么的，我说这个大错特错，每个国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优先顺序来决定，我说中国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把“扶贫”放在第一位，我们就这么做，这个非洲国家很受鼓舞。

主持人何婕：对。那接下来我们这样，开放问题给现场的朋友，好不好，听听他们的观点，来，有问题想要提问的举手，来，这边，欢迎您。

**《决议》表明我们的**

**官方话语体系出现变化？**

观众：各位老师好，我叫刘海峰，是教育行业的从业者。六中全会的《决议》，我通读了一遍，三万多字，原本我以为是很难懂，很官方的一份文件，但是我读完之后发现很生动，很有韵味，然后它里边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话语，而不是一些官方的术语，我想问的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官方话语体系也正在改变，谢谢。

主持人何婕：请坐。他其实刚才说的这个点，很多人的感受，都说读了这份《决议》之后，发现读起来很舒服，就是从语言上感觉活泼生动了很多，两位的观点。

张维为：我就讲，文风是非常重要的，文件中现在你看到有很多比较朗朗上口的金句，“我们办成了想办而办不到的大事”等等，读起来就是蛮令人鼓舞的。我想这个也是我们的文风也在与时俱进，我们希望把这个文风能够不仅是接地气，而且是代表时代的方向，有一种大气，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好的事情。

郑若麟：我也是觉得非常好，因为这样不仅接近了老百姓，而且也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字的魅力，我觉得以后还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美好的。

主持人何婕：对，就像这个《决议》里面也说，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这是中华文明、中国精神的它的一个集大成者，所以您看我们的文字之优美，就在这样的一份《决议》里头，都能让大家敏锐地体会到，这说明确实变化就蕴藏在这里头。好，我们再来看还有没有朋友有问题，来，欢迎这位。

**中国经验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

**是否有借鉴意义？**

观众：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一名研究生。

主持人何婕：欢迎你。

观众：我的问题是，就是我们党在这次历史决议中深刻总结了百年奋斗以来的历史经验和对未来的一些规划，那么这次《决议》对于国际上其它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比如说越南、老挝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或者说是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张维为：越南我还比较熟悉，因为我跟越南的党校的学者交流过，他们私下跟我说的，说我们就是真的是跟在你们后边，一般比你们晚半年，觉得你们这半年下来不错的话，我们也提个类似的口号，然后词不一样，但内容差不多。但我想现在恐怕对整个非西方世界，真的，现在是人家非常关心我们，像很多人从巴西也有的，印度也有的，真的关心中国的成果。因为这些国家尝试了这么多年西方模式，然后最后是一地鸡毛，没有搞好，真的没有搞好。所以现在中国的成功给它们带来巨大的希望。遗憾就是有时候我们中国故事还没有讲好，特别是我们一些表述，人家看不懂，我们自己也在做，包括学术沟通，就是少一点套话，少一点官话，有针对性地跟人家讲故事，你跟巴西讲，你就了解点巴西的情况，跟印度讲就了解点印度的情况，人家的问题会非常具体的，有时候我经常说的，有些发展中国家眼睛里发着光，真的，就期望你给他一个答案，我们怎么就做不到，你们的十分之一我们也做不到，怎么回事？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讲，可以介绍，但它做到是非常难的。

主持人何婕：对。

张维为：你比方说我上次跟非洲讲基层的组织，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把基层农民组织起来了，这就等于把社会重构了，通过农会（农民协会），把每一个农民都加入农会之后，可以实现现代化，叫数字化管理，即使在二十年前我们都可以党中央的声音第二天就传到基层的农民了。那么这个很多国家都做不到的，但这是一种基础性的努力，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但我觉得作为软实力的部分，你该讲还是要讲，人家有个方向，有个参考。

主持人何婕：其实您看我们仔细去读这份《决议》，它的这个历史经验十个大点，里面的内容很多，刚刚您也说了，有很多国家它可能制度也不完全一样，但它也完全可以就自己适合的那个方向去寻找。

张维为：对。

郑若麟：实际上中国的经验也在影响着民主的发源地法国。法国说起来是最早提出民主理论的国家，比方说法国虽然现在左翼政党很弱，极右翼强势，比如说最近法国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说，我们左翼来一个党内选举吧，大家所有左翼都联合起来，推出一个候选人来，不行，弄来弄去，左翼全部加起来不到20%，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过去的那些左翼，比如法共（法国共产党），首先就放弃所有中国现在坚持的一切，党的领导。

主持人何婕：我们现在总结出来的先进经验，他们都没坚持。

郑若麟：但是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理论往往是先行的。法国最近有一个理论学家，就是写《新资本论》的皮凯蒂。他说了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能救法国，为什么？因为他也看到了，按照目前的这个市场经济，法国的市场经济，法国的政党轮流执政的话，法国没有前景，没有前途可言了。

主持人何婕：所以您看，刚才我们只是举了几个侧面，它的历史经验里面有很多丰富的内容，这是一座思想的宝库，所以大家完全可以从中去选取，可能对自己来说有借鉴意义的地方。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没有朋友要提问，欢迎你。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总能引领主流？**

周开富：三位老师好，我叫周开富，来自中铁大桥局集团。

主持人何婕：欢迎你。

周开富：我的问题是，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提到了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全局性的转变，我想问我们党在和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中，为什么总是能够引领主流的意识形态，谢谢。

主持人何婕：请坐。

张维为：应该说这个判断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就是十年前的舆论的生态，你如果回忆一下2011年“7·23动车事故”，您正好是做铁路系统的，那个时候网上全是骂自己制度的，他们那时西方话语占了主导，政府是坏的，国企是坏的，国企生产的高铁、动车肯定也是坏的，就这么个逻辑下来的，而且当时我们的主流媒体也不坚定，很多是跟着社交媒体在跑，所以当时我们都感觉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直到2012年我们十八大前夕，前一个礼拜，我在伦敦，BBC采访我，它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张教授您认为中共会有十九大吗？当时他们真的觉得，可能被我们“公知”给忽悠了，觉得“颜色革命”就要成功，真那么回事情。所以十八大以后发生这个意识形态的变化，西方它真的没有料到，而且西方感到最恐惧的就是，他们原来以为互联网这一代年轻人是站在西方一边的，没想到我们互联网这一代年轻人，“90后”、“95后”，乃至“00后”，三观是超级的正，因为这一代人他更了解外部世界，他是移动互联网的一代，也是中国最自信的一代。当然这和十八大以来“四个自信”的教育也有关系，也和我们真的实实在在的成绩（有关）大家看到，特别这次疫情防控，我引用钟南山这个数据，今天你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免于死于新冠肺炎的自由是美国的606倍，免于感染新冠肺炎的自由或者安全感是美国1600多倍，这是到11月23日的数据。所以这就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制度自信，而这个是意识形态比较根本性的一个转折，我觉得非常之重要。

主持人何婕：对，我想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当年您跟福山辩论。

张维为：对。

主持人何婕：那个时候“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现在大家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事实告诉我们，原来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这个可能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很生动的例子。

郑若麟：他的问题使我想起一个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叫瓦蕾里•尼凯(Valérie Niquet)，她在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担任中国部的主任。她曾经连续七年在这个学刊的年刊上预测“中国明年将崩溃”。但那个时候他们这么说，很多人相信的，但为什么他们最终崩溃了呢？就是我们发展太快了，张教授有一句名言，“一出国就爱国”。过去要知道，1980年代我刚出国的时候，一出国，（有些人）就放弃自己的国家了，留在外面。我1985年到法国的时候，一路从机场到巴黎市，一路看到日本的广告，我说日本产品真厉害。到了市内，我说我去找找有没有中国商品，我找遍了巴黎春天、Lafayette（老佛爷百货）各大商场，找到一个上海产的玩具钢琴，40多法郎，正好我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当时是我在法国找到的唯一的一件中国生产的东西，那是1985年。今天你看看，我2013年回来的时候，想给朋友们带点东西，我当然想带一些法国造的东西，很困难，连奢侈品只有两个品牌不是中国造的，别的实际上都是中国造的，这个就是变化，中国的发展太快了。

主持人何婕：变化会给大家一种自信，变化也会给大家更好地认识我们国家的文化、制度，其实我非常建议大家去认真地读一读这份《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真的荡气回肠。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不懈奋斗，回顾这么多年党的历史，包括我们国家的发展的历史，真的就是大家共同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感到骄傲。好，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

（本节目播出于2021年12月27日）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